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西欧史学的发展

孙秉莹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在于这两次运动都是资产阶级发动的反封建斗争，它们都以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天主教会为口诛笔伐的主要目标。不同之处在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于十四世纪），资产阶级的力量尚小，还不敢和天主教这个庞然大物展开全面拼搏。当时的人文主义者只希望天主教会进行改革，使之不妨碍或少妨碍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们揭露天主教会的黑暗面，不是要打倒它，而是使它改进，不少人文主义者对天主教会冷嘲热讽，反而得到教会的信任，原因就在这里。

宗教改革时期西欧的情况则大不相同，当时通过地理大发现，欧洲的殖民强盗，侵入亚、非、拉广大地区，疯狂屠杀殖民地人民，掠夺财物，亡人之国，灭人之种，用血和火的文字，写下了殖民掠夺的历史。但是这种罪恶活动，对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实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为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开辟了辽阔的市场，聚积了大量资本。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展开，资产阶级的力量迅速壮大，达到与封建势力相匹敌的地位。在有些地区，资产阶级甚至凌驾于封建贵族之上。在这种情况下，西欧资产阶级开始要求推翻封建制度，夺取政权。在宗教方面，它反对为封建贵族服务的天主教会，要求建立为自身（资产阶级）服务的新基督教。这时它对天主教会的指责与文艺复兴时代不同，不是要它改进，而是要推翻它，用新教取代它。双方剑拔弩张，准备作拼死的斗争，凡资产阶级占优势国家和地区，如尼德兰、英国、瑞士、德国西北部、法国部分地区都是新教流行的场所。凡封建贵族占优势国家和地区，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大部地区、德国南部、波兰等地，都是天主教传播的区域。

一、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史学的成就

首先是树立起“重人轻神”的信念。中世纪的天主教会认为上帝是至高无上的，历史是上帝的安排，史学是为神学服务的。人生而有罪（原罪），只有依靠上帝的“神恩”，才能得救。为了获得神恩，许多僧侣和修士履行教会规定的善功（斋戒、朝圣、自答、购买赎罪券等），虔诚忏悔。他们只关心死后得救，不管现实社会的好坏。结果是文化普遍衰落，人民生活更加痛苦。

与此相反，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充分肯定人的价值，相信人是历史的中心，人应该追求现世的自由和幸福。为了把人的思想、感情和智慧从封建神权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他们主张学术文化必须为人服务，教育要能发展人的个性，文艺要能表现人的思想感情，科学要能为人生谋福利。在这种学风的影响下，学术文化普遍提高，社会经济迅速发展。

其次是史学摆脱了作为“神学婢仆”的地位。与中世纪史学相反，人文主义史学家认为历史的创造者是人，不是神，史学不是神学的婢仆，而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不是专门宣传福音，为圣经作注解，而是研究人类社会，企图从历史研究寻出一条富强之道。

例如十四世纪佛罗伦萨大史学家佐凡尼·维拉尼(Giovanni Villani, 1280? —1348)的名著《佛罗伦萨史》十二卷，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史学作品。作者明确指出：他写此书的目的不是宣传神意，而是详细记述佛罗伦萨的社会、经济和商业贸易情况。这本书不仅是记述事实，并随时注意剖析历史现象发生的原因、条件和结果，以便使后世有所借鉴，使佛罗伦萨更加繁荣富强。史家从世俗事务中寻找佛罗伦萨繁荣昌盛的原因，只字不提神的力量。这是人文主义史学的特点。

还有十四、十五世纪之交佛罗伦萨的史学家和政治家列奥那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 1369—1444)也是如此，他主张在全部历史发展过程中排除上帝的作用，用世俗的原因解释历史。他强调人性和人的心理在历史上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他的代表作《佛罗伦萨史》从罗马建城之日起写至1401年。他主张用真实可靠的史料写真实的历史，凡涉及奇闻传说、荒唐不经、迷信虚妄的史料，一律删除。对于珍贵的文献资料和有价值的档案记录，则非常重视，孜孜不倦地加以收集整理，为后世保存了大量史料。此外弗雷维·阿·俾安多(Flavio Biondo, 1388—1463)对考古学、史料学的研究，罗梭索·瓦拉(Lorenzo Valla, 1406—1457)在文献校勘学方面的成就，马基雅弗里(Niccolo Machiavelli, 1469—1527)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方面所表现的深知灼见，无不说明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史学的发展大大超过中世纪时代的水平。

应当注意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所反映的是新兴资产阶级的史学观点，它有很大的局限性。人文主义史学家虽然反对把神意当作历史发展的原因，但由于轻视劳动人民，他们也不可能在历史发展的动力方面有着正确的认识。在他们的心目中，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是帝王将相等英雄人物。他们写了许多传记歌颂这些英雄人物，在这些人当中不是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就是发财致富的新兴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者所说的“人”，是这些人，其中不包括人民群众。

二、宗教改革对西欧史学的复杂的影响

宗教改革对西欧史学的影响是复杂的。表面上看来它使西欧史学后退一大步，但从长远看来，它为以后西欧史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什么说宗教改革在表面上使西欧史学后退一大步呢？只要把当时的史学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欧史学比较一下，便不难看出。如上所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史学家坚决抛弃宗教世界观，主张在全部历史发展过程中排除上帝的作用，用世俗的原因分析历史问题，认为人是历史发展的中心，强调人性和人的心理在历史上所起的重大作用。人文主义史学在这些方面确是向前迈进一大步。但是到了宗教改革时期，新教史学家不但没有继续向前迈进，反而把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史学家所扬弃的垃圾重新收入他们的历史著作中。

在新旧教的论战中路德派新教攻击天主教的主要著作是马提亚·佛拉秀斯(Matthias Flacius, 1520—1575)主编的《马格德堡按世纪顺序论述的教会史》(又名《马格德堡世纪史》，简称《世纪史》)，此书的主要观点，大多是人文主义史学家丢掉的垃圾。如这本书反对文艺

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史学家关于历史前进的动力是人事因素，而不是神意的观点，它认为人类历史是上帝与魔鬼之间的斗争。此书虽然收集了丰富的材料，但没有消化，全书缺乏求实精神，充满主观偏见。它选用的材料主要是供新教论战之用，凡合乎这一要求的资料，都加以采用，否则不用。

此书依路德的政治需要为转移，路德的敌人主要是罗马教皇，凡敌视教皇的材料，均加以肯定。罗马教皇被描绘成凶恶、滑稽的丑角。格留高里七世被说成是杀父者和下毒药的人，教皇权力的产生被说成是魔鬼的煽惑和教皇自身搞阴谋的结果。路德的恩主是德国的诸侯，在论述德国诸侯和天主教会的斗争时，《世纪史》的作者总是和代表世俗政权的诸侯们站在一边。在他的笔下，诸侯和国王总是笃信宗教，僧侣总是诡计多端，教皇总是反基督的人。

天主教对路德新教的回敬主要有凯撒·巴洛尼奥(Caesar Baronius, 1538—1607)撰写的《教会年代纪》和彼得罗·斯福查·帕拉维西诺(Pietro Sforzo Pallavicino, 1607—1667)撰写的《特伦特宗教会议史》。此二书都利用了当时最大的图书馆——梵蒂冈图书馆。在丰富资料的基础上，史家本来可以写出一部比较好的书来，但为了替天主教辩护，作者不惜歪曲事实，以诬陷为能事。巴洛尼奥注意的中心主要是想证明天主教会并不象新教徒所说的那样腐化堕落，而是很纯洁的。帕拉维西诺利用了许多未曾发表过的文件，在资料上他占明显的优势，但对这些资料的解释，他肆意歪曲。

宗教改革时期的史学虽有这些缺点，但它还是为后来西欧史学的发展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在这里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论述：

第一，自从1517年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以后，新旧教双方展开长期的论战，双方都以历史为武器，以历史批判的方式，互相攻击，引起了西欧各国人民对史学研究发生极大兴趣。当时西欧各国人民，不属于旧教，便属于新教，这一论战对他们息息相关，为了深入了解论战的来龙去脉，他们对研究历史产生兴趣是可想而知的。

第二，史料问题的解决。研究历史首先碰到一个史料问题，史学家钻研历史，没有史料是不行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史家手中不能没有史料。在西欧中世纪，教士是唯一的知识分子，几乎所有的文献资料统统收藏在寺院和教堂里边，寺院里的僧众也有研究学问的，但人数极少，许多珍贵资料堆积在那里，任凭鼠咬虫蛀。学者掌握不了资料是当时一个突出问题。正在此时，西欧各国先后发生大规模的宗教战争，德国的农民战争(1524~1525)、士马尔卡登(在萨克逊境内)战争(1531—1552)、三十年战争(1618—1648)、法国的胡格诺战争(1562—1598)、尼德兰的革命战争(1566—1609)以及英国亨利八世时代所进行的反对天主教会的政治斗争。这些战争和政争使许许多多的寺院和教堂被掠夺一空，其中除无数珍贵器物外，还有更加珍贵的文献资料和许多为人所不知的档案材料和其他手稿。对历史研究来说，这些文献资料是具有不可估计的价值。学者们很快看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以十分低廉的价格，到处收购这些宝物。十六世纪德国许多新办的大学图书馆中的藏书，法国许多著名藏书家的收藏，差不多全是寺院抛售出来的。

大量的文献资料从寺院转入学者们手中，对欧洲学术(包括史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学者们手中有了资料，如虎添翼，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很快出现了一股学术研究的热潮。收集、校订、研究、考证、出版文献资料，成为学者们工作的中心。为了清理学术资料，各种辅助科学，如：年代学、古文字学、古文书学、语言学、校勘学都慢慢发展起来。

这些学者知识渊博，史料熟悉，但还不能算是历史学者，因为他们不善于概括，他们的工作只是为历史研究作准备。他们被称为博学家，1600—1750年间是博学派学者在西欧学术界最活跃的时期。

三、宗教改革之后西欧史学的发展

(I) 法国学者的成就

如上所述，宗教改革激发了人们对历史研究的兴趣，聚积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为以后的史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到了十六、十七世纪，西欧史学便出现了振奋人心的成就，特别是法国学者的成就更大。例如，安得烈·杜申（Andre Duchesne, 1584—1640）编纂的《法国史》，其中资料完全是在胡格诺战争中收集起来的。《法国史》原计划编纂成24对折本，前14本包括从六世纪到十五世纪之末所有法国历史家的著作，后十本专载法国各省的地方史，但此书没有编完，1640年杜申死于车祸时，前一部分只出版了矮子丕平统治以前德国史家的著作，后十卷也只出版了古代诺曼作家的著作五卷，（1619）。这些书也都是没有序言和注释，但原文的史料价值很高，特别是诺曼史部分成为后来所有研究诺曼史的学者们不可缺少的书卷，直到19世纪末期这些书方为一些新校刊的版本所取代。

耶稣会的僧众为了反对宗教改革也从事于文化学术的研究，《圣徒传全集》的编写，就是他们发动并领导的。《圣徒传》是浩如烟海的文献史料，其中有大量的宝贵史料，也夹杂着许多迷信传说。以约翰·玻兰达斯骨（John Bollandus）为骨干的僧团决心剔除其中的糟粕，并确定《圣徒传》作为史料的价值，从而提高天主教會的威信。此书共分18卷，后三卷（16、17、18）为补编。《圣徒传》早期各卷前面所附的序言在当时是历史方法和校勘学方面的重要著作，在补编里边编者论证作者、偶像崇拜、宗教仪式、年代学、风土学等问题。末尾附有一部难解字和专用字字典以及全书索引，这些都是很有用的。但此书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它不是按照历史年代顺序而是按照圣徒节（每个圣徒都有一个节日）。这样编出的材料用起来很不方便。

除耶稣会的玻兰达斯派僧众外，当时以学术成就著名的还有圣本尼迪克特僧团所属的圣摩尔诸寺院的学者们，他们也是披着纯学术研究的外衣为天主教效劳的，摩尔派最早一个著名的学者是所谓“摩尔派之父”的路克·达希里（Luc D'Acheay, 1609—1685），他的代表作是《中世纪未刊文献集成》（巴黎，1655—1667），此书作为第一手资料具有重大价值，使他名垂后世。除他之外，摩尔派著名的僧人学者还有马昂比和蒙福孔等人。

马比昂（Jean Mabillon, 1632—1707）的主要著作是《圣本尼迪克特僧团的圣徒传》（1668—1701），此书是集体编写，以马比昂为主编。在许多序言和注释中，他批判地论证每个世纪的主要事件，考订教皇们和国王们活动的年代，澄清了诸如女教皇佐安一类的错误传说（相传九世纪在教皇利奥四世之后有女教皇佐安其人）。过去有许多人认为圣本尼迪克特僧团有圣徒80人，马比昂断定只有25人，他不避威胁，坚持写史要说真话的原则。

马比昂除上书外，还有两部著名的著作——《圣本尼迪克特年代记》和《古文书学》六卷。后者尤为重要。马比昂在此书中无可争议地证明一个古代文献是真实的这种建设性的工作，他作到了。他把大量同时同地和同国的文献，加以比较，从中得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从而确定了检验特许状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他把古文书学这门新学科建立在巩固的基础

之上，虽然距离今天的要求还很远，但他所奠立的基础是不可动摇的。

马比昂的批判才能和忠于学术的态度使他不断和顽固派发生冲突。1698年他写了一篇著名的论文《论无名圣徒崇拜》，抨击当时天主教廷在罗马挖掘圣徒遗骨，用高价出售的罪恶行径和欺诈行为。他提出鉴别圣骨的原则，让人注意早在九世纪，教皇格留高里四世业已指出当时罗马已无真正的遗骨，现在挖掘圣骨纯属骗钱行为。这篇论文受到顽固派的压制，迫使马比昂不得不加以修改。

蒙福孔(Bernard de Monfaucon, 1655—1741)出身于奥贝贵族家庭，除历史学外他还精通考古学和目录学，1708年他出版了一部名著《希腊古文字学》，为写此书他参考了11,630件手稿，此书的出版为后世学者研究希腊历史大开方便之门。在考古学方面，由于1635年法兰克王契尔得利克(Childeric, 741—751)陵墓的发现，法国研究考古学的风气大为流行。法国大臣科尔伯特(Colbert)要求考古学者编写一部载有法国境内一切罗马古迹的著作。1719—1724年间，蒙福孔先后出版《古迹说明》15巨卷，附有1120幅巨大的铜版雕刻画片和一千多幅较小插图，其成就超过了科尔伯特所料想的。1729—1733年间他又出版了一部《法兰西王国古迹考》，这本书成为前书的续编，但远逊前书。

蒙福孔的著作中最受学者欢迎的是《图书目录》，此书写成于1739年，花了他40年的时间。欧洲大小图书馆的所有存书，均收录其中，为学者们搞研究大开方便之门。

在非教士的俗人学者中最著名的是查理·杜·夫朗·杜·孔日(Charles du Fresne Du Cange, 1610—1688)。他的代表作是《中世纪拉丁文辞典》(1678)对折本三册。他除参阅已出版的资料外，还查证了六千多件手稿。中世纪拉丁文夹杂着许多蛮族词汇和其他与古典拉丁文完全不同的专用语和词汇，需要专门研究。在这项工作方面，杜·孔日用去了大半生时间，为后世学者研究中世纪拉丁文手稿，作出了贡献。

拜占廷学的建立也和杜·孔日有密切关系。十五世纪以前西方学者对拜占廷的历史是不重视的，这首先是由于双方长期以来在宗教上的矛盾引起了难以和解的仇恨，其次是由于西方瞧不起拜占廷这个衰落、悲惨、无足轻重的国家。因之西方学者在吉本之前很少有人注意拜占廷的历史的。这种情况到了十五世纪开始有所转变，转变的原因是由土耳其的侵略引起的。

1453年土耳其攻陷君士坦丁堡，拜占廷帝国最后灭亡。征服拜占廷后，土耳其分兵两路进攻欧洲，陆路沿多瑙河到达维也纳，海军沿地中海西进，与西班牙、威尼斯以及罗马教皇的海军频频交锋。整个欧洲在土耳其大军的打击下，大为震动。这时西方学者们想到千余年来拜占廷捍卫欧洲的功绩，没有拜占廷的屏障，西方就很难出现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因之产生了研究拜占廷的热潮。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对拜占廷的研究特别热心，在路易十四的支持下，法国学者开始编写的第一部有关拜占廷的历史著作《拜占廷历史家著作汇编》。法国特别热心研究拜占廷的原因有二，其一，是出于民族自豪感，如所周知，第四次十字军多为法国人，他们在拜占廷建立过拉丁帝国，统治过巴尔干一带的广大地区，研究拜占廷的历史同时也显示了法国的业绩。其二，是法国和拜占廷都是专制制度，研究拜占廷的专制制度，不但起到宣扬君主专制政体之效，也为专制政体的政治理论提供了根据。

在编写《拜占廷历史家著作汇编》(法文版)的工作中，杜·孔日起重要作用，此外他还单独出版了《中世和近代希腊作家辞典》(1688)和《法国诸帝统治下的君士坦丁堡帝国史》(1657)，在研究拜占廷的历史方面，谁也赶不上杜·孔日的成就。

(II) 宗教改革之后欧洲其他各国史学的发展

宗教改革之后激荡起来的学术气氛，逐渐弥漫于欧洲，继法国之后，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德国等国莫不受到影响。

十六世纪英国就出现了一位著名的藏书家和出版家——马太·帕刻 (Matthew Parker, 1504—1575) 他在宗教改革时期，首先抢救由于许多寺院被解散而散佚出来的文献宝藏，成为英国最大的藏书家之一。他出版的书籍是：《史学菁华》，这是一部用拉丁文写成的英国编年史，从远古写至1326年。还有马太·巴黎 (Matthew Paris) 撰写的《大历史》以及阿塞 (Assers) 撰写的《亚勒弗烈大王传》。除出版藏书外，他还鼓励托马斯·波德力 (Thomas Bodley) 爵士大量收购书籍，为后来波德力图书馆在牛津的建立打下基础。

从都铎王朝到斯图亚特王朝时代，英国著名的史学家有萨维尔 (Sir Henry Savile, 1549—1622)。为了把中世纪英国的许多编年史手稿从尘埃中抢救出来，1598年他编写了一部《比得以来著作汇览》 (Scriptors Post Bedan)。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的史学家有亨利·斯帕尔曼爵士 (Sir Henry Spelman, 1562—1641)，他的代表作是《英国教会的宗教会议、法律和规章》 (1640) 和《渎圣罪的历史和命运》，他写作是从王党的角度出发，当时是不受欢迎的。直到1692年他去世半个多世纪以后这本书才得出版。

撰写英国的封建制度和寺院制度最著名的史学家是威廉·达格对尔 (William Dugdal, 1605—1686)，他的《英国寺院》一书在英国大受欢迎。他的巨著《英国男爵勋位》一书更受欢迎，被誉为仅次于《定罪日簿册》的一部有价值的记载。1677年他被封为爵士，1686年去世。他的自传 (写至1678年) 附有日记、礼记和所藏手稿索引，出版于1827年。达格对尔主要是个收藏家，只会机械地编纂材料，没有批判才能，常常不能辨别材料真伪。这位史家堕落到剽窃他人著作的地步。

和法国不同，英国没有类似波兰达斯派和摩尔派那样的学术团体，历史研究都是个别学者分散进行的。英国最有水平的历史著作也远远赶不上法国的历史著作。由于没有僧侣，英的学者不是俗人，就是接近俗人的教士。他们可分为两派，一派以文笔酣畅著称，一派以收集资料、校订资料驰名。十七世纪英国著名的史学家差不多全是王党，清教徒除对自己的历史外根本不重视历史，他们对过去没有兴趣，他们的史学家都是政论家。

在西班牙1597年卡斯特罗·得·博巴第拉 (Castillo de Bobadilla) 出版了两卷《对总督和诸侯的政策》，此书是腓力二世统治时期西班牙地方行政制度的知识宝库，多次重印，风行一时。1672—1684年间，尼古拉·安敦尼奥 (1617—1684) 先后出版了《古代西班牙书目提要》和《新西班牙书目提要》，记录从公元前奥古斯都时代 (前27—14年) 直到1670年所有西班牙的作家和著作。

德国的学术文化经过三十年战争 (1618—1648) 的破坏之后，衰落异常，值得一提的史学家，只有赫尔曼·康林 (Herman Conring, 1606—1681) 一人。他不但熟悉史学，还懂得法律、医药、自然科学、语言学等学科。1672年他撰文论证林道特许状是伪造的 (在马比昂著作之前)，引起德国学者们的注意。他用历史观点研究法律，对后世学者很有影响。康林在品格上有严重缺点，他研究学术不是为了说明真相，而且为了讨好权势者，他接受法国国王的年金，屡次主动撰文鼓吹要把神圣罗马皇帝的帝冕加于法王路易十四之首。他提出的许多建议都是以支持再联合办公室的危险政策为目的的。

十七世纪意大利的史学可以说是奄奄一息了，境内只有一个有真才实学的历史学者，此

人是路多维科·安敦尼奥·穆拉托里 (Ludovico Antonio Muratori, 1672—1751) 他的著述有对折本46卷、四开本34卷。他写自己的代表作《意大利作家汇览》，是用了十五年时间。这本书把所有六至十五世纪意大利史家的著作，尽收录进去。每部著作都有序言和许多注释。此书的补编是《意大利古事记》六卷。主要论述中世纪意大利的政治、军事、制度、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文献资料汇编。他在一生的最后五年，还写出《意大利年代记》一书。英国著名史家吉本认为这部书是从耶稣降生到十八世纪中叶的一部虽然枯燥、但是精确有用的意大利史略。

四、结 束 语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在西欧学术文化的发展上是一个转折点，这两个运动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在于两者都是资产阶级发动的反封建斗争，不同之处在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从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认为人是历史的中心，肯定人的价值。认为推动历史发展的是人，不是神。写历史不是宣传福音，而是写人类社会，他们在历史中排除上帝的作用。用世俗原因解释历史。与此相反，宗教改革时期的新教史学家，把宗教世界观作为研究历史指南。关于教皇权力的增长不是从世俗方面找原因，而是从魔鬼煽惑方面寻根源，写历史不是为了揭示真相而是为了传布福音，凡此种种可以说明宗教改革时期的史学比起文艺复兴时代确是落后一大步。

宗教改革对史学的影响是复杂的，虽然表面上它表现得落后一大步，实际上它为后来西欧史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是因为：第一，新教和旧教的长期论战引起欧洲各国人民对历史研究极大的兴趣。其次是多次大规模的宗教战争，把寺院藏书以极低的价格，抛售于市场，为学者们解决了史料问题。最后是学者们得到史料，在求知欲的推动下，他们埋首于编书工作。他们不但收购、聚积资料，准确地介绍历史文献的原文，并对史料作深入研究。在宗教改革及以后的一段时间内（主要是十六、十七世纪），搜集、整理资料比撰写历史更受重视。这些书卷出版的数量之巨达到惊人程度。从1650年到1750年百年之间，仅法国一国就出版了有关早期教会史和中世纪史的原文多达四百对折本以上，卷帙浩繁的中世纪编年史、圣徒传记、国王、教皇以及高级教士的信札，寺院和宗教会议的文献，以及各省的地方史料，成为学者们从事发掘的无尽宝藏。各种助辅学科随着历史研究的需要也先后出现。年代学、古文书学、古文字学、语言学、题铭学等等都慢慢发展起来。

现在资产阶级史学界经常把欧洲十七世纪这些成就誉为科学历史研究的开端，实际并不是这样，只能说是这时期史学的进展为后世历史研究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他们整理出版的史料，是后来的史学研究不可缺少的。他们做的工作是值得肯定的。

本文主要的参考书：

Ernst Breisach: "Historiography, Ancient, Mediaeval, Modern", 第十一章, 1983年出版。

J.W.Thompson: "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第三十七章, 1967年出版。

G.P.Gooch: "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19th Century".

N.C.加尔金主编:《欧美近代现代史学史》，中译本，1986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16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孙秉莹:《欧洲近代史学史》，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